

不負此生(下)

傅漢洵 / 口述 朱婷 / 撰文



▲傅漢洵赴新加坡時，被寄予厚望。當地華文媒體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



▲傅漢洵夫婦近照

傅漢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蘇門答臘省丁宜市，後遷往先達，籍貫中國廣東潮陽海門鎮。1959年12月底啟程回國，1960年5月加入廣東省羽毛球隊。退休前任中國羽毛球國家青年隊副總教練、廣州市體育局羽毛球隊總教練等職，培養出吳迪西、關渭貞、勞玉晶、林燕芬、謝杏芳、張潔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奧運)冠軍。



▲1978年，國家體委原主任王猛(右一)與獲頒“體育運動榮譽獎章”的傅漢洵(左二)握手。



▲1985年，獲得尤伯杯後，傅漢洵夫婦與愛徒吳迪西、關渭貞、勞玉晶的合影。

因為腰傷和膝蓋傷，我已遵醫囑，多年不再打羽毛球。路過球場時，就遠遠看着，也是津津有味。

傷痛會伴隨着運動員的一生，我也沒有例外，祇是有遺憾。

因球結良緣

回國時，我孑然一身，一腔熱血祇為心中的羽毛球夢想和中國羽毛球事業。幸運的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收獲了人生的寶貴經驗與財富，還找到了知己和相伴一生的妻子。

我的妻子曾秀英祖籍福建，是馬來西亞歸僑。1960年我正式加入廣東羽毛球隊時，她已經是一名“老隊員”了。在生活與訓練中，她對我悉心幫助；慢慢地，我也不由自主地喜歡上這個直率、刻苦、勤快的姑娘。

感情何時萌芽，什麼時候“走在了一起”，都已記不清了，祇記得那時我們會一起從隊裏出發，走到廣州市人民中路的一棟舊樓裏，去探望她父親的好友——李挺一。李公公(秀英稱)一家居住的房間擁擠逼仄，卻總願意留我們在家吃飯。他是秀英“娘家人”中，第一個認可我們關係的。

在隊裏，我們卻成為了生活檢查會上的“靶子”，常被要求做自我檢討。可我們覺得“冤枉”，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情，祇是有了好感，在生活中有更多主動的接觸，相互關心而已。秀英脾氣直，她挨的批比我還多。

1970年五一勞動節，我和秀英終於結婚了。那年年初，我們步行到射擊場的一座兩層樓下，樓中有幾間空房，秀英看到廣州市體委人事處處長畢敬清，就問道：“畢處長，這些房子能不能住人呀？”“能呀，你要不要？”畢處長笑着說。“要！當然要！”秀英迅速回答。畢處長認真了起來，讓我們以結婚的名義打報告，很快獲批。我們終於有了單獨的住房。

儘管那是一樓的一間空房，幾乎沒有家具；儘管睡的是4條長凳架起的一張床板；儘管那裏頗為荒涼，蚊蟲多，但那是我們的家，我們在那裏擁有了2個女兒，收獲了實實在在的幸福。

遺憾轉場

1969年，廣東羽毛球隊訓練恢復，我欣喜不已，準備大展拳腳。可1970年下半年開始，腰部疼痛逐漸嚴重，後來下肢也開始發麻、疼痛。醫生說，我的身體無法再承受大運動量的訓練了，如果繼續堅持很可能導致癱瘓。

醫生的話猶如晴天霹靂，生生地砸在我腦子裏。父親的期望，家人的驕傲，我的夢想、汗水、努力……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成了空。時也運也命也，我最終還是沒能站在國際羽毛球大賽的領獎臺上。我痛苦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終祇能接受現實。

那時，妻子籌辦的廣州體育館體校羽毛球班正缺人手，在心愛的羽毛球面前，別的選擇都無法抗衡。我最終還是和妻子搭檔，加入創辦廣州體育館體校羽毛球班的行列。時代不同了，或許在下一代的身上，我們這一代未竟的夢想可以實現！

那時羽毛球還是“貴族運動”，普及率很低，在廣州幾乎找不到有羽毛球基礎的少年兒童。我與妻子祇要有空就往小學校跑，重點針對此前廣東羽毛球隊發展過一批對羽毛球運動感興趣的中小學體育老師們。後來，我們常去的幾所學校都成為了廣州市具有羽毛球特色的學校。

那時，每周一，老師們來到體育館接受培訓，再回去向孩子們傳授。老師們會將體育館練壞的殘舊羽毛球撿回去，給學生們練習使用；後來還聽說有的老師動員孩子們從家裏拔雞毛、鴨

毛，以修補殘壞的羽毛球，為此甚至驚動了家長，擔心孩子們是要做什麼壞事，急忙前去了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是從小的耳濡目染。幾十年後，羽毛球運動在廣州蓬勃發展，廣州成為世界羽毛球頂級賽事“大滿貫”第一城，良好的群眾基礎和運動普及率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1973年，廣州市中心業餘體育學校成立，羽毛球是最早的項目之一，我與妻子是第一批羽毛球教練。廣州原五十六中的禮堂被安排為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訓練館。那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禮堂，水泥地面粗糙不平，頭頂的石棉瓦“弱不禁風”，門窗破敗，冬日裏冷風呼嘯而入，還能在裏面打旋兒。

校方在我們的要求下，“修理”了門窗：將窗戶都封了起來，原大門找回，勉強維修使用。到了夏天，不通風卻裝着大功率燈泡的禮堂就是一個“蒸籠”，廣州酷熱天氣下，館內溫度可達40℃。

我們就在這樣的訓練館以驚人的意志力量堅持着。1975年夏天，時任上海羽毛球隊教練蔣永誼專門來廣州，想向我們“取經”。他來到禮堂後簡直傻眼了，才幾分鐘他便汗如雨下。他認真地問我：“你們就在這裏訓練？你不是在騙我吧？”

可是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我們在全國同行中脫穎而出，向許多專業隊伍輸送了人才。甚至在1977年全國青年羽毛球賽團體賽上，依次戰勝了上海、福建和湖北等6支專業隊伍，成為賽事上的一個特殊“現象”。1978年，全國業餘訓練和推行《國際體育鍛煉標準》工作會議舉行，我與另外3名體校教練員一同獲得了“體育運動榮譽獎章”。

1978年12月，由於我們的出色成績，廣州市正式獲批成立羽毛球隊，這是全國第一支市一級專業羽毛球隊，它開辟了一個新時代。

“國際賽事”再立威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門敞開，我與湯仙虎、林豐玉受國家體委委派赴澳大利亞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羽毛球教學。在第一站帕斯，當地羽協官員接待我們的時候，態度傲慢輕怠。在第一節課上，羽協官員表示，他們平時也有印尼的教練帶隊，不知道我們的水平與他們相比如何，希望我們與曾是印尼國手的兩位教練來場比賽。

彼時我因腰傷已退役多年，湯仙虎也正逢身體不適。但大局面前我們毫不怯場，說打就打。於是，中印兩國的前國手在澳大利亞帕斯“狹路相逢”。這榮譽之戰我們打得很激烈也很過癮，最終擊敗了對手。這看似一場簡單的比賽，卻是我們退役後的一場國際比賽。我們再一次為國爭了光；更證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羽毛球運動員“無冕之王”實至名歸。

後來，我還被指派到新加坡執教，並助力新加坡選手黃循杰在1983年第十二屆東南亞運動會上擊敗“世界羽壇霸主”印尼隊的多名選手，奪得新加坡在東運會史上第一枚羽毛球金牌。據說，這是新加坡羽毛球館建館50多年來，第一次有本土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上主場奪冠。那天，為了這次勝利，他們史無前例地奏響了3次國歌。我與有榮焉。

……

2003年，我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副主席，作為教練的羽壇生涯就此結束。在我和秀英培養的運動員中，產生了6位世界冠軍(其中1名奧運冠軍)。父親對我的期望，對中國羽毛球的期待，幸而在他們的身上都一一實現了。

我從印尼漂洋回來，為之拼搏了、奮鬥了、見證了、更成就了，其間有無數血汗、有刻骨遺憾，有至上感動與激情，有友情、愛情、親情……此生何其有幸。

參考資料：傅漢洵/口述 劉晨/整理：《赤子情·羽球魂——傅漢洵回憶錄》，南方日報出版社。



▲全家福



▲1983年，傅漢洵教練與新加坡國手黃循杰及隊友的合影。



▲傅漢洵在訓練館內向學員講解步伐。

走進三坊七巷

尋找閩都文化“根”與“魂”

的三坊七巷最負盛名。

一條街就是一個故事。古老的坊巷格局歷經千年，仍然基本保留完整。都說“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國近代史。”在這片僅有40公頃的城市中心，雲集了衆多名人故居。

南後街是三坊七巷的中軸線。其中，郎官巷內就曾住着我國“精通西學第一人”。百年前，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譯家、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在這條窄窄的小巷中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時光。

1854年，嚴復出生在福州一個醫生家庭。留學歸國後，嚴復擔任北洋水師總教習，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海軍人才。

令人稱道的是，嚴復將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譯成中文。這本書鮮明表達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



化觀點，給中國人敲響了救亡圖存的警鐘。

面對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他積極倡導變法維新，由他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至今仍在沿用。

2021年3月2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重回三坊七巷，走進了嚴復故居。他與嚴復的故事由來已久，早在



福州派江吻海，山水相依，城中有山，山中有城，是一座天然環境優越、十分美麗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福州的古建築是構成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因素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曾在《〈福州古厝〉序》中這樣評價福州以及福州的古建築。

福州這座擁有2200多年歷史的城市，歷史遺迹衆多。其中，被譽為“裏坊制度活化石”和“明清建築博物館”

擔任福州市和福建省領導期間，習近平就積極推動關於嚴復的研究。1993年至2001年，福州先後5次召開嚴復學術研討會，習近平十分重視、全程關注。此外，習近平還親自主編了《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一書，他在序言中寫道：“時至今日，嚴復的科學與愛國思想仍不過時。”

除了嚴復，從三坊七巷走出的歷史文化名人還有很多。林則徐、林覺民、冰心、林紓、沈葆楨……他們從深巷中走出，斯人已逝，但精神永存。不過，這片人杰地靈的寶地，也曾面臨被破壞的風險。

1991年3月10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三坊七巷林覺民故居開現場會，啟動了整個三坊七巷保護修復的序幕。也正是在這次現場會上，習近平同志指出：“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要在我們的手裏，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且還要讓它更加增輝添彩，傳給後代。”

此後，三坊七巷內其他的老房子，也陸續被修繕、保護起來，為延續福建的“根”與“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今，三坊七巷不僅是福州市民的驕傲，也是福州名副其實的“城市名片”。行走三坊七巷，穿越古今，人們也更加感佩當年城市管理者的遠見和魄力。

“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歷史和文脈。對待古建築、老宅子、老街區要有珍愛之心、尊崇之心，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文化遺產。”時隔30年，總書記對福州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始終牽挂于心。

歷史文化遺產不僅廣續着城市的文脈，更承載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彰顯着文明的無窮魅力。

(傅欣)